



习近平家语

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

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83—284页

家视界



1991年3月何白李先生在王爷庙家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运动占据了我们的童年生活的主要部分。”何开四说。
在这样的家教下，四个儿子均为大学生，其中两位高级工程师，一位高级编辑，曾在四川某知名媒体担任副总编。而何开四196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厦门大学，任《当代文坛》主编近20年，创作了大量作品，获得全国、省级奖项百余次。
“现在我结实的身體依然能勝任繁重的工作，豁达的性格能經受住生活的折騰。”如今定居成都，年近八旬的何开四，退休后兼任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会长。

八字家风及三字家训

四个儿子在全国各地成家并育有子女。1980年，年逾七旬的何白李，开始以家书为载体，将包括自己祖辈在内的百年何氏家庭家风家教予以凝练，传给后代。
他在家报创办不久便提出“为了祖国的未来，也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除了本身应作有效的努力，还应当把眼睛更多地放在后代的培养上。”他将自己父辈列为第一代，自己为第二代，四个儿子为第三代，孙辈为第四代。从1980年到1998年11月，近20年，每月至少一期的家书家报或家庭诗刊，陪伴着何家第三代家庭的父母子女们，共同成长成才。

“家书自兹绝。”在整理何白李家书后，20余岁便向何白李求学的兰永生，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兰永生看来，随着时代发展，人们交流工具的变迁，像何白李家族般，以手写形式的家书，或许将不再有，“但家书中倡导子孙辈要爱国奋斗，并教育各家庭不要‘围着分数打转转’，要五育并举，重视艺体兴趣培养等思想的光辉，却一直闪耀至今。”兰永生说。

1987年11月17日，何白李在家报第50期时倡导要“充分发扬中国几千年来家庭这一特殊组织的优良传统”“在家庭，在国家，在人类，都有自己所作出的一份贡献”。并在1989年初，第63期及第68期明确提出了“和睦、勤俭、奋发、追求”的八字家风，以及“清、慎、勤”三字家训，并多次长篇对其解读。

其实，何白李自身的行为就是对家风家训的最好诠释。“家书家报的起源便与‘和睦’相关。”兰永生讲述，何白李与夫人感情深厚，1980年夫人病逝后，身在泸州的何白李与分别在全国四地的儿子开始了每月一封的家书。他1983年开始办家庭小报，并阐明“《家庭小报》是家书的一项发展”，可“介绍一家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也可讲“当地有趣故事、地方风物人情”等。自此，虽然一大家人难得相聚，但因为家书，彼此都了解对方家庭的生活点滴，大家庭一直和睦至今。

家报中常常有各家喜讯，第三代几个家庭的夫妻考上高级工程师、获得教师资格证、经济师或升职、被评为“三八红旗手”等，第四代孩子学习取得进步、运动会获奖、竞赛得奖、发表作品等，都在家报中呈现，并设立家庭奖学金，“家庭擂台赛”拼比等小项目，形成了几代人“奋发、追求”的氛围。

家风家教的滋养下，何家第四代不仅个个学习优异，人人擅写作，并都有自己的艺术强项。

何开三之女何晓从小成绩名列前茅，喜绘画，外语突出，留学海外硕士毕业后，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奖项，曾作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被表彰；何开二之女何如成绩突出，运动能力强，在学校、市、省各类运动比赛中获奖，毕业于安徽大学。何开四之子何西8岁时就可以横渡长江，后来北大硕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

新时代的传承

“一旦公诸于世，必定照亮许多人的心灵”。几年前，兰永生读到这批家书后，开始了多年的整理和推介。

“天下之本在家，家书既是维系家人情感的一种方式，也是无言的家风教育，润物无声地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灵。”泸州市妇联在了解到何白李家书后，开始与兰永生共同出版家书。近日，泸州市妇联在规划未来家庭教育工作时，明确提出要“用好《何白李家书》等特色资源，以好家庭好家风涵养好家教。”

在何开四看来，家书的整理出版，从家里走到家外，是一种新时代的传播传承。如今，何开四也有了自己的孙女，虽然难得一见，但在频繁的电话、视频交流中，他也不断以各种方式教导孙女爱党爱国，全面发展，学会创新。

“孙女学习生活都很有追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擅长竖琴，近期还在学校的乒乓球赛中获奖。”何开四说，他们兄弟几家几代都很期待家书的出版，准备让自己的后代家庭常常共读。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婚育观” 系列讨论之十一

用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支撑新型婚育观

石鑫

近年来我国人口初婚年龄不断上升，大龄未婚者群体也在扩大。不少适龄青年陷入“恐婚”“忧婚”“懒婚”等状态。这种婚育观的变化，及随之而来的低生育率，引起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事实上，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战后“婴儿潮”到生育率下降的转变。中国“七普”数据也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可以说，低生育率是人类婚育行为的一次系统性转变。为解释这一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学者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随着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人口迁移增加等变化，个人价值观发生了剧烈转变，从强调家庭传统规范和责任观念转向强调个人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继而带来了推迟结婚、同居取代婚姻、离婚增加，以及推迟生育、非婚生育和减少生育等婚育行为的变化。这些改变了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也导致了生育率的长期低迷。

按此理论预测，在价值观念方面变化越大的国家生育率应该越低。然而，事实却相反，在第二次人口转变完成度最高的国家中，例如北欧国家和荷兰，生育率却更接近更替水平。要理解这一现象，还需引入影响婚育行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政策。

20世纪70年代，北欧国家出现了一轮家庭政策改革热潮，向在职父母、单身父母和低收入家庭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以应对社会和家庭变迁带来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7—1.8之间，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很多研究者认为，北欧国家生育率上升的原因正是政府对育儿家庭提供了慷慨的支持措施。

以瑞典为例，16岁以下儿童每月可领取1250克朗（约合875元人民币）的普通补贴，多子女家庭还有额外补贴；父母育儿假一共有480天，其中有390天休假者可以获得之前收入近80%的补贴；瑞典父亲还可专享3个月的假期（不能转让给母亲）。据统计，2020年瑞典父亲们的休假天数可达到夫妻总休假天数的

30%。在瑞典的公园、街头和咖啡店，推着婴儿车的父亲已成为一道风景，被称为“拿铁爸爸”。这些措施有效减轻了家庭养育成本，分担了母亲的照料负担，也改善了两性关系。相关统计显示，瑞典的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均处于欧洲领先水平。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研究发现，提高生育率与提高性别平等的家庭福利政策密切相关，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关系。

回到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已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些特征。但是，受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道德观念的影响，从整体来说，人们依然认同婚姻和生育的价值。与日韩等国相比，中国35岁以后还未婚的人口比例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近日共青团对“Z世代”青年婚恋意愿的调查发现，影响结婚意愿的原因中第一位是“找到合适的人很难”，占60.8%，第二位是“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占56.2%，选择“结婚的经济成本太高”的占46%。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对婚姻仍怀有较高的期待，而结婚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则成为制约婚育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要提振婚育意愿，让更多年轻人适龄婚育，在倡导婚姻家庭价值观的同时，亟需从政策层面给予有力支持，减少个人承担的婚育成本，特别是降低女性在生育养育教育中的过重负担。

完善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从国际经验看，有以下做法可供我们借鉴：

一是加大公共托育服务供给。目前中国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难以满足家庭的发展需求。去年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提出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托育机构和托位数量持续增加”的目标，未来还需进一步出台更多有力措施，综合运用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提高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有效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二是要落实父母育儿假制度，使父亲育儿假时长与母亲休假期时达到合理比例。近期各地纷纷出台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普遍将母亲产假延长到158天左右，并增加了15—30天的父亲陪产假和10

天左右的父母育儿假。一些地方还规定，经单位协商同意，母亲可将部分延长假期转让给父亲。这就在制度层面为男性休育儿假扩大了空间。然而，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设置了父亲育儿假，由于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很多男性不愿意休假，或休不够法定时长。同时，在我国目前的规定下，男性育儿假期间的工资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这也大大降低了男性休育儿假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政策实施过程中加大宣传倡导，在全社会普遍树立父母共同育儿的理念，并进一步调整细化政策措施，通过顶层设计，减轻用人单位承担育儿假期间工资负担，逐步延长父亲育儿假时长，使之与母亲休假期时达到合理比例，如三分之一左右，切实减轻生育给女性带来的“母职惩罚”。

三是要加大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力度。过重的生育与养育负担会给女性就业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些用人单位忽视女职工生育权益和劳动权益的就业歧视行为，也直接影响了女性的婚育意愿。对此，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应加大对女性就业权益的维护力度，落实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开展针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公益诉讼，依法惩戒对女性就业歧视的雇主；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生育成本的国家、家庭、用人单位分担机制，统筹协调社保基金对生育津贴的覆盖，创新对雇佣女职工较多企业的税收减免等措施，减少企业因雇佣女性带来的成本；第三，要广泛营造性别平等和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通过财政、税收、场地、人才等支持措施，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通过开展假期和课后儿童托管服务、开办托育点、采取弹性工作制等方式，缓解个人发展和家庭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帮助男女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使工作和家庭相互促进，而非此消彼长。

只有在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支撑下，才能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信心，真正树立起共建共享、向上向善、男女平等、代际和谐的新型婚育观，使家庭成为每个家庭成员梦想启航的地方，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婚恋观报告《“30+”脱单图鉴》发布

七成“30+”拒绝只恋爱不结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百合佳缘集团日前在北京发布2021~2022中国男女婚恋观报告——《“30+”脱单图鉴》（下称《报告》），围绕“30+”单身人士对婚恋的认知感悟、行为做法等，深入剖析当下社会单身人群的婚恋思想变化，旨在通过多角度的观点分析，让广大适婚人群对婚恋的认知更加清晰，对婚恋的选择更加理性。

“30+”脱单压力大 男生比女生急

《报告》显示，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是“30+”的单身人群集中地，未婚男性占比高达68%，未婚女性为56%。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86%男性以及91%女性都曾有过恋爱经历。

在男多女少的婚恋现状中，男性的脱单压力更大，以37%的占比超过女性的24%。同时，近六成“30+”单身们表示，父母曾介入过自己的婚恋。具体来看，35岁是介意拐点，子女的年龄越大，父母的介入比例反

而下降。另一方面，子女学历越高，女性父母越为其操心，男性父母操心程度有下降趋势。

对子女而言，父母的介入导致他们焦虑。数据显示，男性焦虑度为55，女性为46。在此压力下，“30+”的单身们更加迫切于脱单，49%的男性与30%的女性，都想尽快摆脱单身状态，而男性的迫切程度远超过女性。

“30+”不愿降低择偶标准

生活方式单一，交友圈越发变窄，是导致“30+”的单身人群“落单”的主要原因。《报告》显示，“社交圈窄”被60%的单身女性与40%的单身男性，共同视为阻碍脱单的最关键因素。此外，“对异性不了解”“经济原因”等都是单身男性的脱单难点。单身女性则认为“符合自己条件的人少”“对婚姻有担心和恐惧”。

《报告》统计，只有34%的男性愿意降低标准，女性占比仅有18%；此外，高达43%的女性和22%的男性，坚决不愿降低标准。具体来看，“有责任心”“性格合拍”“有上进心/进取

心”是女性最无法降低的择偶标准；男性则要求对方“善良”“性格合拍”和“诚实”。

《报告》表明，“30+”单身们心里都有恋爱起步价。女性要求对方的薪资为12317元/月，男性的要求是4636元/月。近三年，单身心中的恋爱起步价连续上升，且男女对起步价要求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

30岁对心态影响大

《报告》显示，谈及30岁带来的心态变化，大多“30+”的单身都展示了积极的状态，例如自己变得更有包容性、会主动反思之前的恋情等。然而，也有消极的影响，男性对恋情不再自信，女性则开始在感情上学着留后路，单身们更追求有结果的爱情。对于只恋爱不结婚，七成单身直接拒绝。

很多人认为，什么阶段要考虑做什么事，这种说法被称为“社会时钟”，对此，半数左右单身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和生活节奏，不该用“社会时钟”以一概全。

中国平凡家庭家风的范本，四川泸州何白李家家庭20载写家书、办家报、发家庭诗刊——

『家庭小报』香满陋室 温润四代人心灵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跨越两个世纪，一家四代，代代有读书人，代代多翘楚，无论是文科还是工科出身，个个会写诗写文章，通外语，并倡导“老中青少”，日日体育锻炼，人人有文艺擅长……这是四川省泸州市何白李大家庭的写照。

出生于20世纪初的何白李，毕业于四川大学英国文学系，先后在泸州一中、泸州师范学校任教并担任校领导，终生从教，他感念于父亲读书求学历人一生，继承父辈遗志后，在70多岁高龄时，带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9位家人，写家书、办“家庭小报”，发家庭诗刊，近20年不间断，集家书、小报及诗刊等30余万字，希冀将家风家训接续传承。

他在“家庭小报”中时时教督儿孙要爱国爱家，“有所作为，振兴中华，国有国风，家有家风，风气好，家和国都会兴旺发达”，并凝练出“和睦、勤俭、奋发、追求”八字家风和“清、慎、勤”的三字家训。

“孝慈仁爱，勤俭耕读。何白李家书家报中，既有谆谆教诲和温情絮语，又有忠贞爱国的庄严训导。”四川省泸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何白李家书家报内容涉及做人、谋事、育人、国学以及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诸多领域，虽办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有典型意义。“是中国平凡家庭家风的范本，也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典范。”

在四川省妇联的指导下，泸州市妇联携手整理者兰永生，历时3年，整理编辑《何白李家书》一书，巴蜀书社即将出版。

陋室里办家庭小报

“父亲重言传，也重身教。”何白李四子何开四回忆，父亲曾说，“作为父母，也如教师一样，都有双重任务。一面要自己很好地做人，另一面要把孩子培育成人。”何开四说：“父亲要求孩子们做到的，一定率先垂范。作为校领导，他始终保持清廉本色。”

如今，在泸州师范学校，还能看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庙，外圈异常平凡。20世纪60年代，在小庙临时改造的教师宿舍里，何白李有一间大约18平方米的房间。何开四回忆，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多次分房，父亲都一律辞让。“光阴荏苒，整整43年间，父亲没搬过家”。

一张挂着旧得发灰的蚊帐的小木床，一张堆满各种书报纸张的大木桌，一排排摆满各类书籍的书架，就是何白李居住了43年的小屋。在这间陋室里，何白李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创办了“家庭小报”，还在此义务辅导了大量的求学者，作为市人大常委会也接待了众多来访者。“父亲自奉甚俭，却十分关心教师的生活。他多次在政协、人大大声疾呼要提高教师福利，特别要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何开四说。在何家孩子们眼里，大公无私是父亲一生做人的基本准绳之一。

何白李有四个孩子，分别是何开一、何开二、何开三、何开四。何开四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给孩子们买玩具，衣服也是四兄弟挨个儿穿，但书却是一本接着一本买。也不强求孩子们读书，却强求孩子们锻炼身体，一大早必须起来跑步。“只要不下大雨或大雪，我们天天都被父亲赶着去锻炼，户外